

唐宋类书“文部”的文体文献学价值

党圣元 任竞泽

提 要 唐宋类书是中国古代类书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类书的编纂方法与总集文体分类有密切关系,其指导写作的目的与文体学著作和文体总集的功能是相通的。唐宋类书“文部”胪列评论文体的体例在中国古代文体纂述体例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独到地位。从唐宋八大类书所引古代文体书目之数量和频次分析,可以发现许多文体学嬗变规律以及唐宋人的文体观念发展变化。作为“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了“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

关键词 唐宋类书 “文部” 文体总集 文体文献学

唐宋类书是中国古代类书发展史上的成熟和关键时期,其兼有“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的性质,堪称是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沾溉众多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亦不例外。本文在大量考析唐宋类书之“艺文、文章、文学、杂文”等“文部”文体的基础上,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八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例,深入进行文体学上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凸现唐宋类书在中国古代文体文献学上的地位和价值。

一 唐宋类书“文部”的文体学特征

唐宋类书是中国古代类书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类书的编纂方法与总集文体分类有密切关系,其指导写作的目的也与文体学著作和文体总集的功能是相通的,从中也显现出其文体学价值和意义。

类书与总集文体分类的关系。类书在体例上“区分胪列”与总集文体分类之“类聚区分”的纂辑方法有相同之处。即王应麟《玉海》李桓序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①胡道静云:

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它们的形式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本是由此得来,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传》语);“事类相从,聚之义也”(皇甫谧《甲乙经序》语)者是。^②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类家”序云:

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古昔所专,必凭简第;综贯群典,

① [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②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页。

约为成书。此类家所由起也。自魏《皇览》而下,莫不代集儒硕,开局编摩;乃私家所成,亦复猥众。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①

类书的这种“类聚胪列”的分类方法与中国古代总集的分类方法可谓同源异流,殊途同归。我们知道,中国历代总集选本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渊薮,傅刚先生《文体辨析与总集之编纂》总结道:“魏晋六朝时期文学总集的编纂,以文体分类从而带有辨体的目的。”②挚虞编纂《文章流别集》之体例便是“区判文体”和“类聚区分”。如《晋书·挚虞传》:“挚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最著名的总集选本体例亦以“汇聚”“分类”为主的。如萧统《文选序》:“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分类之中,各以时代相次。”③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也是从“区别部类”来“论古今文体”的。褚斌杰先生对此云:“在中国,文体分类的尝试和出现,肇始于文学总集的出现和文学批评的萌芽。”④可见,总集和文体理论著述的文体分类都很相似。论其渊源,则这种“区别部类”的分类方式,当受汉代以来中国古代目录学分类的影响。

类书与总集在文体学上的密切关系尤其能从宋初类书《太平御览》与总集《文苑英华》的编纂及文体比较分析中看出。宋初《太平御览》与《文苑英华》相继纂成,二书不但时间上先后而成,而且纂者人数及身份都大体相同。如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云:

参与纂修《英华》诸人中,有八人皆为参与《太平御览》者。……意者,《御览》实成于太平兴国七年,故当时能抽调编辑诸人之大半以从事《文苑英华》之修纂,但完成者不过为进请删定之稿本,不为定本。⑤

《文苑英华》所列文体如下: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哀吊)。《太平御览》所收文体如下:诗、赋、颂、赞、箴、碑、铭(铭志附)、七辞、连珠、(御制)、诏、策、诰、教、诫、章、表(启、奏、劾奏、奏状、奏弹、弹事、奏劾、弹文)、驳奏、论、议、笺、启、书记(尺牍、笔札)、诔、吊文、哀辞、哀策、檄、移、露布、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品量文章、叹赏、史传。可以看出,两书所列文体大体无大出入,基本是相同的。可以这样说,《太平御览》文部就象是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而《文苑英华》则是《文章流别集》,二书相辅相成,合则为一文体总集,分则文体理论与文章选本互相独立,互相生发。这一现象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唐宋人之类书和总集编纂相同的文体学思维方式以及相同的指导写作功能。

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古今事文类聚》之编集体例具有类书和总集的双重功能,已然开明代吴讷、徐师曾文体总集的先河。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九流绪论》

①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③ 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330页。

④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页。

⑤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161页。

下云:“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①《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鉴书》云:“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②胡道静对《艺文类聚》这种类书兼总集的体例所述尤为详切:

《艺文类聚》在辑存文献的方法、方式上,有一重大特点,和它以前的类书及以后的大多数类书非常不同,从而构成了它自己在类书群中的独特之处,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以往,“文”自为总集,“事”自为类书,正如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所说的:“《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其结果是“文义既殊,寻检难一。”欧阳询为了解决这个不方便的问题,于是新创体制,事与文兼,汇为一书。他说:“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事前、文后,便是《艺文类聚》每一个子目的体例。……

欧阳询创造的这个类书体例,后来宋人的《事文类聚》、清代官修的《渊鉴类函》都摹仿它。……^③

《艺文类聚》《古今事文类聚》之“先事后文”的体例,既说明了类书与总集的关系,也体现了类书“文部”的鲜明文体纂述体例。也就是说,其“先事”大多综罗古代文籍中的有关文体言论,并符合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敷理以举统”的文体研究思路;其“后文”则属于总集选本体例,符合刘勰的“选文以定篇”。这种文体总集的纂述体例,上承《文章流别志论》而下启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的编纂体例。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

类书的“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使得其在一级分类的大类中主要以“题材”分类,而这种一级题材分类在《文选》中便有了“以题材分类”的二级分类,如《文选》赋类按题材诸如“京都、郊祀”等分为15类。宋代《文苑英华》这个大型的文章总集则在39类文体的一级分类之下,每个文体的二级分类都以类书类的“题材”分类进行细密分类,可以说是文体分类和类书分类相结合的极致。其后如《唐文粹》等历代总集都有沿袭此种按题材分类的文体分类之举。

在古代,类书和总集编纂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写作,即“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这与文体著作和文体总集的功能是相通的。如胡道静所云:

类书储材待用,一方面是备仓卒应对之需,一方面也是为撰文、作诗资料之需。封建时代的诗文,大多是需要堆砌典故。临事得题,不得不乞灵于类书,而平日不得不有所预备。虞世南之为《书钞》,当然主要是为此。白居易作《六帖》、元稹作《类集》、晏殊作《类要》、秦观作《精骑集》等等,无非都是如此。封建政府的编纂类书乃至书坊的辑录类书,也是提供文人以这种方便。^④

类书的这种“两脚书厨”和“獭祭”之作用与总集之注疏即章句家的“书麓”(案李善注《文选》,号为书麓,也即章句家)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如出一辙,即闻一多先生所谓“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依此出发,闻一多先生清晰地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转引自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6页。

③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107页。

④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26页。

勾勒出总集、类书与文人别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作了详细阐释。他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然后说: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地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史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是强词夺理吧?①

类书、总集这种指导创作的功能与所有文体著作都是指导写作的功能是一致的。《文心雕龙》这一文体之集大成者便是。如《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云:“《文心》一书的宗旨是指导写作,全书的各部分篇章也是按照这一宗旨组织安排的。”②类书的这种“以类相从”的分类方法以及指导写作的“看文体”功能,在《初学记》中体现的最为充分。《唐会要》卷36《修撰篇》云:“开元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名曰《初学记》,至是上之。”③唐刘肃《大唐新语》卷9记载《初学记》的编纂源起云: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便省,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④

其所谓“须检事及看文体”云云,指类书便于“检事”的功能和作用即上述“獭祭”“书簏”之功;而“看文体”则指各种类书“文部”中大量胪列评论各种文类文体,以指导各体文章写作,尤其体现出了类书“文部”的文体学价值。

二 唐宋类书“文部”部类体制概说

唐宋类书的文体学价值不但体现在上述各方面,而且其“文部”胪列评论文体的体例在中国古代文体纂述体例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类书独特的文体纂述体例不但上承刘勰《文心雕龙》之“原释选敷”的文体研究方法和挚虞《文章流别志论》的纂述体例,而且还直接影响启发了明代几大文体总集的编纂。经过对现存唐宋类书的翻检对比,我

① 闻一多著,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③ 《唐会要》卷3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7页。

们认为《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八部唐宋类书之“文部”较为典型,大体可代表唐宋类书“文部”之文体学概貌和成就。下面我们对唐宋有代表性的类书“文部”文体体例进行择要列举,以见概貌。

(一)《北堂书钞》,隋虞世南撰。一百六十卷,分十九部,八百五十一类:帝王部、后妃部、政术部、刑法部、封爵部、设官部、礼仪部、艺文部、乐部、武功部、衣冠部、仪饰部、服饰部、舟部、车部、酒食部、天部、岁时部、地部。按:下列类书多如此类,不再逐一列举。“艺文部”共收录21种文体。其部类体制以“谏”为例如下:

谏,述行丧纪能谏,累事称之。哀公谏孔丘,世祖谏吴汉。《说苑》云:柳下惠死,人将谏之。妻曰:将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妾之知。为谏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谥宜为惠。弟子闻而从之。《东观记》:平原王葬,邓太后悲伤,命史官述其行迹,为作传谏,藏于王府。《诗传·曾子问》篇云:贱不谏贵,幼不谏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谏之,诸侯相谏,非礼也。郑注云:谏之为言,累也;累举其生平实行,为谏而定其谥,以称之也。附《檀弓》篇云:鲁哀公谏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子位焉。呜呼哀哉,尼父!案宣圣之谏,数处文有不同。《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谏之曰:昊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而《史记·孔子世家》与《左传》所载全同班氏。《前汉·五行志》则云:孔丘卒,哀公谏之曰:昊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又与《史记》异。《补东观记》云:杜笃与美阳令交游,数从请托,公遂谏之。上自为谏,贵贱操笔四十余人,章章殊兴,句句感切,古今莫比,一时所推。

(二)《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部类体制以“赋”体为例:

《毛诗序》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释名》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也。《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与图政事,故可以为列国大夫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咸有惻隐古训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广之语,设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称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又曰:上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游猎,所幸官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辞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嘉。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又曰:枚皋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皋不通经术,谈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慢戏,以故得媒渎,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皋为文疾,受诏辄成。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汉书》曰:成帝赵昭仪方大幸,每上往甘泉宫,常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扬雄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迎厘三辰。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惩斋戒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典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以为式。《东观汉记》曰: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赋颂。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桓子新论》曰: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赋,用精思大剧。而立,感动发病。子云亦言:成帝上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脏出地。及觉,大少气,病一岁。余素好文,见子云工为赋,欲从之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

其后备载《祢衡别传》、《魏志》、王隐《晋书》、《文士传》、晋陆机《文赋》、汉扬雄《反骚》、后汉班彪《悼离骚》、晋挚虞《悯骚》、魏陈王曹植《九咏》、梁元帝《拟秋风摇落》、梁武帝《赋体》、梁任昉《赋体》、梁王僧孺《赋体》、梁陆倕《赋体》、梁柳惺《赋体》、魏文帝《典论》、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有关赋体的文章或言论,兹略。

(三)《初学记》,唐徐坚等撰。其体制概貌如下:

文章者,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盖诗言志,歌永言,不歌而诵谓之赋。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矣。三代之后,篇什稍多。又训诂宣于邦国,移檄陈于师旅,笺奏以申情理,箴诫用弼违邪,赞颂美于形容,碑铭彰于勋德,谥册褒其言行,哀吊悼其沦亡,章表通于下情,笺疏陈于宗敬,论议平其理,驳难考其差,此其略也。

(四)《唐宋白孔六帖》,唐白居易、宋孔传撰。部类体制以“铭”为例如下:

白——铭则序事清润《选》。铭博约而温润《文赋》。《礼》曰:“君子之观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言美其人为此铭也。孔——铭朝覲碑崔融《典东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见融铭,叹美之。及已封,即命《铭朝覲碑》。撰王承宗先铭萧俛。尝诏俛撰《王承宗先铭》,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后复,臣不忍称道其先。”又辞:“成,当有饷谢。拒之,则非朝廷抚纳意;受之,臣谊不当取。”帝善而止。赐宸宸台衡二铭马燧斩李怀光,降众犹万六千。还太原,帝赐宸宸、台衡二铭,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义堂。试彝尊铭崔涣起家亳州司功参军,还调,于是入判者千余。吏部侍郎严挺之试《彝尊铭》谓曰:“子清庙器也,故以题相命。”读者怜其志李华为元德秀权皋铭,称道深婉,读者怜其志。咏其形容有异于古《文粹》李翱《荅寺僧书铭》:“古多有之,汤之《盘铭》、卫孔悝《鼎铭》、秦始皇之《峩山铭》。蔡邕《黄钺铭》以纪功于黄钺之上。近代为铭,大抵咏其形容,有异于古人之所为。其作钟铭,则必咏其形与其音节,与其财用之多少,铭铸之勤劳尔,非为勒功德劝戒于世也。铭以题勒示后李善《文选注》。功德卓异者所皆铭纪权德舆其文雅正贍缙,当时公卿侯王功德卓异者,所皆铭纪十常八九。《左传》。八佐在吴铭双阙于盘石。李白《陀罗尼幢颂序》。

(五)《太平御览》,宋李昉等撰。部类体制以“赞”为例如下:

《释名》曰: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文心雕龙》曰: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词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词者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如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而论词,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也。李充《翰林论》曰: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晋书》曰:稽含,绍之孙也。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为赞。含援笔为之,文不加点。其略曰:嗟乎,先生高迹何同?生处岩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寄非其所,没有余辱。粹有愧色。又曰:卫恒,字巨山,为黄门郎。善草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悦之,故竭思以赞其美。《世说》曰:羊孚作《雪赞》,曰: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伊遂以书扇。

(六)《事物纪原》,宋高承撰。部类体制以卷四“经籍艺文部”之赋、连珠等体为例如下:

赋——《诗序》:六义,次二曰赋,当谓直陈其事尔。《左传》言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于后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因谓之赋。故昔人谓赋者,古诗之流,以荀宋为始。《汉书》曰:不歌而颂曰赋。《释名》曰:敷布其义曰赋。

颂——《诗序》:六义,其六曰颂。盖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有商、周、鲁三颂。《文心雕龙》: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则颂起于帝喾也。

箴——《文心雕龙》曰:轩辕舆凡,以弼不逮,即为箴。又曰: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尚存。及周辛甲百官箴阙,虞人之箴,体义备焉。

连珠——傅玄曰:连珠兴于汉章帝,班固、贾逵、傅毅皆受诏作之体。则假喻达旨,贤者微悟,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曰连珠。梁沈约云:连珠之作始自扬子云。欧阳询作《艺文类》中亦有扬雄连珠,则为斯文之兴不自汉章明矣。

(七)《古今事文类聚》,宋祝穆编。部类体制以别集5“文章部”之“露布”为例:

《群书要语》:露布,人多用之,以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见其国,布散者,人尚武;文采者,则甘露迟重。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视听也。

以下在“古今事实”中举列与露布相关的典故并说明出处,如倚马而作、书帛而曳、标于漆、下马作露版、小捷不作露布、德宗感泣等条目。接下来在“古今文集”中选于公异《破朱泚露布》全文作为示范,兹略。

(八)《玉海附辞学指南》,宋王应麟撰。部类体制以《玉海》“艺文部”之“论”体为例:

郑康成曰:论者,纶也,可以经纶世务。刘熙曰:论,伦也,有伦理也。刘勰曰: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以下按时代先后选文定篇,论述经典范文的写作背景及出处等,包括汉《素王妙论》、《盐铁论》、桓谭《新论》、《王命论》、《沛王通论》、《演经杂论》、《论衡》、《六儒论》、《潜夫论》、《六艺论》、《御寇论》、《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篇。

三 八大类书文体数目和引书数目统计分析

唐宋类书不但数量众多,名著辈出,堪为历朝之最,而且由于编纂目的和用途不一,也使得各大类书对“文部”的重视程度及所收文体数目、纂述体例等都有较大差异,从而在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上的地位也大不相同。通过对《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唐宋八大类书文体数目和引书数目及频次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文体学发展的重要观念和规律,有助于加深和拓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

(一)《北堂书钞·艺文部》

文体统计: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诏敕、章、表、书记、符、檄、策、简、牋、札、刺、券契。

引书统计:释名(计引6次,以下同),诗序7,文心雕龙3,文章流别论8,文赋3,典论3,叙连珠,汉书20,后汉书10,左传6,礼记6,史记4,魏志6,东观汉记10,世说新语5,论衡3,魏略4,法言3,新论4,汉武故事3,文士传4,王隐晋书16,谢承后汉书3,鲁国先贤传3,抱朴子3,臧荣绪晋书5,与吴质书3,语林3,荆州图记3,荆州记3,述征记3,晋中兴记

3 穆天子传 2 唐书 续晋阳秋 神仙传 搜神记 河图记 献帝春秋 列仙传 帝王世纪 吕氏春秋 宋书 蜀志 文章叙录 吴志 汉旧仪 晋八王故事 潜夫论 易 论语 周礼 魏书 会稽典录 耆旧传 说苑 诗传 豫章记 南史 西京杂记 虞氏家记 李充起居住 南部新书 袁兴万年书 十六国春秋 汉武别传等。

(二)《艺文类聚·杂文部》

文体统计:史传、集序、诗(列杂体诗 36 体)、赋、七、连珠、书、檄、移。

引书统计:释名 4 文章流别论 4 毛诗序 3 典略 7 汉书 7 东观汉记 3 世说新语 3 魏志 3 王隐晋书 3 叙连珠 文选序 说文 魏略 典论 广雅 七谟序 吴录 新论 论语 左传 列子 史记 穆天子传 祢衡别传 文士传 赵书 尚书序 曹植文章序 续晋阳秋 后汉书 博物志等 约三十部。

(三)《初学记·文章第五》

文体统计:诗、赋、祭、誓、诔、铭、训诰、檄移、笺奏、箴、赞、颂、碑铭、谥册、哀吊、章表、笺疏、论议、难。

引书统计:典论 6 文赋 4 论语 3 翰林论 3 法言 3 叙连珠 与吴质书 世说新语 史记 论衡 抱朴子 王隐晋书 尚书 盐铁论 剧秦美新 西京杂记等。

(四)《白孔六帖》

文体统计:诗、赋、颂、论、铭、诔、箴、碑、檄、射策。其它:表奏(封事)、制诰、对问、谏诤、吊、挽歌、碑铭、谥等。

引书统计:文选李善注 9 文粹 7 汉书 左传 诗经 后汉书 文赋 封氏见闻记 五行志 卢氏杂说等。

(五)《太平御览·文部》

文体统计:诗、赋、颂、赞、箴、碑、铭(铭志附)、七辞、连珠、(御制)、诏、策、诰、教、诫、章、表(启、奏、劾奏、奏状、奏弹、弹事、奏劾、弹文)、驳奏、论、议、笺、启、书记(尺牋、笔札)、诔、吊文、哀辞、哀策、檄、移、露布、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品量文章、叹赏、史传。

引书统计:文心雕龙 28 文章流别论 8 释名 11 翰林论 7 说文 6 文赋 4 典论 3 金楼子 5 独断 3 铭论 七谟序 叙连珠 与吴质书 2 汉书 14 后汉书 12 三国典略 10 唐书 17 隋书 9 东观汉记 8 后周书 8 世说新语 10 晋书 14 梁书 5 宋书 4 魏志 5 后唐书 3 北齐书 2 魏略 2 礼记 4 周礼 2 王隐晋书 5 左传 4 齐书 3 十六国春秋 2 博物志 4 南史 5 语林 3 西京杂记 2 文士传 2 国朝传记 4 国史补 3 后魏书 2 祢衡别传 3 法言 2 尚书 3 魏书 2 诗序 2 晋中兴书 3 史记 4 张璠汉记 2 列子 庭诰 钟嵘诗品 赵录 陈书 颜氏家训 国朝雅记 郑玄别传 零陵先贤传 晋令 齐道记 西征记 荆州图记 荆州记 述征记 异苑 论衡 闽川名士传 晋春秋 春秋前燕录 新论 吴书 周书 吴录 蜀志 南齐书 尚书故实 梁典 穆天子传 吴志 晋史 北史 通俗文 周易 陶渊明遗戒 颜延年庭诰 杜恕家事戒 东方朔传 小说 汉仪 政论 唐文苑传 风俗通 汉制度 太公金匱 皇览 孔子家语 三辅决录 语录 齐春秋 高士传 鲁国先贤传 李充起居注 古诗 续晋阳秋 嵇氏世家 列女传 齐谐记等。

(六)《事物纪原·经籍艺文部》

文体统计:诗(五言、七言、律格、联句、唱和、次韵)、赋、论、策、议、赞、颂、箴、连珠。

引书统计:文心雕龙 10 苏氏演义 5 诗序 2 事始 2 释名 叙连珠 周礼 左传 管子 列女传 齐谐记等。

汉仪,战国策,唐会要,隋书,张璠汉记,山海经,吕氏春秋,乐书,蒙求,六帖,世说新语,东方朔传,本事诗等。

(七)《古今事文类聚别集·文章部》

文体统计:诏(制、表附)、露布、檄(移文附)、箴、铭、颂(赞附)、诗、赋、诗话、连珠、判。其它卷:吊慰、挽章、墓铭(墓碑、行状附)、赋、古诗。

引书统计:群书要语 10,文心雕龙 4,说文 3,诗大序 3,文赋 2,世说新语,释文,初学记,唐选举志,释名等。

(八)《玉海·艺文部》

文体统计:记志、传录、诗(歌附)、赋、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其它卷:诏令(诏策)、檄、露布、碑、铭、七、连珠、百一、册、封禅、封事、铁券、德音、笏记、玉牒、玺书、誓等。

引书统计:释名 6,文心雕龙 4,文章流别论 3,古赋辨体 6,乐府诗集 2,文章正宗 2,文选,百官箴序,汉书艺文志,史记 2,尚书,汉书 2,易,礼记 2,周礼,仪礼,诗大序,通志,古今注,白虎通,宋书,唐乐志,诗集传,文章辨体等。

《辞学指南》十二体:制、诰、诏、表、檄、露布、箴、铭、记、赞、颂、序。体制概貌见第五章,兹略。

分析可以发现:(1)在文体数目上,唐代类书“文部”所收文体类目还相对较少,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到了宋代则日渐增多,如《太平御览》和《玉海》已经多达三四十种。如果上述八种类书综合起来互相补充,则其所罗列文体几可包罗覆盖唐宋以前所有文体,其荟萃文献之功不言而喻。上举八大类书无论从文体数目还是引书数目上,都以《太平御览》最为详尽。而且《太平御览》的体例更符合刘勰文体论的研究思路,其文体文献之丰富也非其它类书可比。当然,若从开创性和时代先后来讲,则《北堂书钞》当是类书文部文体纂述体例的滥觞。因为据考证,《北堂书钞》是虞世南在隋朝时纂成的。其次则是《艺文类聚》,尤其是《艺文类聚》之类书兼总集的编纂体例,对宋代类书《古今事文类聚》及明代吴讷、徐师曾等人的文体总集都有启发,上节已述,兹略。(2)从引书来分析,八大类书虽引书数量和频次不等,除了大量引述各类经史子集外,对文体著作诸如《文心雕龙》《文章流别论》《独断》《铭论》《释名》《翰林论》《叙连珠》《诗序》《文选序》《七谏序》《文赋》《典论》《诗品》《乐府诗集》等都颇为重视并频繁引用,反映出类书编者强烈的文体学意识,也进而使得唐宋类书“文部”具备了成熟的文体学著作之实。《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虽引书都很丰富,但其引述学术史上公认的文体论著如《文章流别志》《文心雕龙》《翰林论》《典论》《文选》等都非常少,说明了唐初类书的文体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很主动。到了宋代《太平御览》,其不但于《文心雕龙》《文章流别志》《典论》《独断》《铭论》《文章缘起》等重要文体著作之引述无一遗落,而且引述次数上也大幅度上升,尤其对《文心雕龙》可以说是每体必引,而且是全文载列,足见其文体理论意识的增强,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心雕龙》等文体论著在宋人眼里要比唐人看得更加重要。也因此,《太平御览》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类书作为文体文献和文体理论纂述体例的典型代表,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3)唐宋类书与明代吴讷、徐师曾等文体总集之体例和引书比较。吴、徐文体著作体例特点是:增加了唐宋以来新增文体,并主要引述宋人朱熹、真德秀、吕祖谦等人文体言论,这是唐宋类书所无的,也是吴、徐的功劳所在。但其所引述唐宋以前典籍

之文体言论,可以说都能从唐宋类书中找出源头和出处,没有超越唐宋类书的地方。

四 唐宋类书的文体文献之功及编纂体例的影响

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在文体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其作为“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了“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这就使得我们在千百年后,可以编辑编纂出一部文体文献资料专书,有益和方便现代学者的文体学研究。

胡道静称类书具有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的性质,是“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唐宋类书的文体资料文献之功表现在:1.校勘古籍中的文体文献。一方面各大类书所综罗的文体文献有互出重出现象,可以互相比对校勘;另一方面用以比较元、明以来文体总集中文献之真伪讹漏。2.各大类书引书之丰富,从中可见古代文体资料的渊源出处及文体学的源流发展等。3.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类书对研究“文体”专题的搜集文献资料之功。关于类书之搜辑专题文献资料之功,胡道静云:

这是因为古类书本来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而它包含的科目又是比较完备的。在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工作中,利用它们来对某一专题搜集文献资料,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也免得耗费过多精力。当然,类书上的资料是第二手的,还需要用原始资料来加以核对。但是它们已将一定门目的资料辑集在一处,起着“索引”的作用,比我们自已一开始就直接从散漫无边而又浩若烟海的文献中去寻第一手资料,其效果自大不相同。因此,古类书在今天清理文化遗产工作中的资料搜集阶段起着助手的作用。这样就构成了它的第二特殊作用。

古类书不但把某些专题的文献资料大体上汇集在一起,产生着“索引”的作用,还因为它具有第一特殊作用,即保存了一批原始材料已经失传的东西,因此在古类书中能够看到的某些材料,就已置代了第一手资料,这是更为可贵的。所以在祖国古代文化清理、研究的资料工作中,是不能够离开了类书来进行的。^①

接下来,胡先生列举了如下从中国古代类书编辑出的各类著作:《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中国古代足球资料汇编》、《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中国古代机械发明史》、《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汇编》、《中国古代数学史料》、《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民间数学》、《中国地质史料》、《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接木的记载》、《我国历代分枝谷类作物的概况》、《古人对棉花特征特性的观察》等等。这些史料汇编专书“都曾利用了古类书来搜集资料。例子非常的多,上面只是偶而举一些。”^②此外,胡先生还以《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为例,总结了利用古类书协助进行文献资料普查工作的典型例子,并对其效果进行总结:(1)古类书已从各种古籍中辑录的这一专题资料,得以借用。(2)古类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失传的,也就是今天在其他任何书籍中找不到的这一专题资料。就如序文中所说:“其中有些资料虽然各书互见,但有些原著早已散佚不传,却由于编纂者的时代不同、着眼点不同,因而得以分别保存。”^③

①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46页。

②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48页。

③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49页。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中“文部”浩瀚的文体文献资料集中摘出,汇集成文体文献专书,可名为《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编》。这不但在文体文献学上非常重要,而且对于文体学的学术研究无疑是最基础和最便捷的工作,当有益于和便于现代学者的文体学研究不浅,其意义不言自明。这完全可以作为一项研究课题提到研究计划中来。也就是说,唐宋类书已将中国古代文体方面的资料集辑在一起,起着“索引”的作用,“比我们自己一开始就直接从散漫无边而浩若烟海的文献中去寻第一手资料,其效果自大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唐宋类书中“保存了一批原始材料已经失传的东西”,这在文体研究中弥足珍贵。此外,历代文体文献可以互相校勘,其文献学价值不可估量。

上述类书在撰述体例上虽然各有不同特点,但都与《文心雕龙》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研究思路颇为相似,只是各有繁简不同而已。如“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且其综罗文献之功不可没,后世未有超出它的。

类书文部文体编纂体例不但影响了王应麟《辞学指南》、陈仁子《文选补遗》、祝尧《古赋辨体》等的纂述体例,而且对明代吴讷和徐师曾两部文体“集大成”之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如果我们以唐宋类书中每一文体的文献汇辑及引书丰富与吴、徐著作中的相关文体进行比较分析,便可清晰看出吴、徐著作与唐宋类书中所论文体相去有多远,以及唐宋类书之全和吴、徐之浅陋。这样一来,以唐宋类书的巨大文体学贡献为参照,再重新审视明代吴讷和徐师曾两部文体总集的成就,其“集大成”的美誉或许会大打折扣了。这是一个大题目,非本文所能胜述。

(作者通讯地址:党圣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00732;
任竞泽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责任编辑 晓 宁)